

# 文化



# 葡萄牙向世界擴展的意義 (十五至十七世紀)

*Luís Filipe Barreto*\*

## I

自15、16世紀，隨着歐洲西端向全球伸展，世界開始滋長一個無限的空間革命。在16、17世紀期間，西歐（尤其是荷蘭人和英國人）跟隨着這次由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發起的開拓新大陸。

15和17世紀期間，世界整體的生活結構開始出現。由於剩餘經濟產生世界貿易的初等元素，並產生世界文化的初步輪廓，使東西、南北之間交流了思想和著作以至糧食和習俗。然而，重要的是沒有誇大歐洲人這次在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擴展的重要性，儘管其影響是透過“……西端基督教徒，其征服的海洋和世界其他地方之緊張”而開展了國際貿易和全球文化“……其他大陸的堅實文明——非洲、亞洲、美洲大部分，他們繼續其本身的生活，歐洲人的活動只觸及他們的表層……”<sup>1</sup>。

15、16和17世紀期間，葡萄牙和葡萄牙人在歐洲向世界擴展中擔當着流浪者和主要的角色。

在14世紀末期，在相關的商業航線和網絡的基礎上，對地球最多的認識大概等於其真實面積的四分之一，並且是由伊斯蘭文明掌握。

在16世紀中葉，對地球的認識首次接近其真貌，可及的航線和網絡全握在歐洲基督教徒的手裏。

---

\*歷史學家、里斯本大學導師

1. Pierre Chaunu,《古典歐洲文明》，Estampa, 里斯本，1987年，第1冊，第20頁。

15至17世紀的歐洲海上擴展，首先意味着這個無限的空間革命，以及意味着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總體國際權力中心從伊斯蘭教徒的手裏轉到基督教徒去。

海上擴展使葡萄牙和葡萄牙人成為全球的中介者，世界信息的傳遞者。各類的葡萄牙人（航海家、商人、士兵、傳教士、冒險者）成為非洲、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最大歐洲傳播者（反之亦然）。

15和16世紀的葡萄牙，透過海上擴展，成了歐洲的世界之窗，亦作為世界其他地方的歐洲之窗。

## II

葡萄牙人向各海洋和大陸擴展是由一系列的多重和各式因素而產生的。首先，在15和16世紀期間，人口若100至150萬的細小王國懂得使用和發揮本身長期的天然和策略因素。

葡萄牙在地理上和文明上是一處多重匯聚的地方。

是歐洲和非洲之間匯聚的地方，因為伊比利亞半島一半是歐洲一半是非洲北部。是歐洲南北之間匯聚的地方，因為葡萄牙海岸是連繫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海上網絡和航線的交匯處：“……在整個北大西洋沒有一處更合適的地方航行至溫水帶，海岸線由里斯本至直布羅陀……”<sup>2</sup>。並且是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間所有貿易、技術和政治，以至基督教、伊斯蘭教和猶太教文明的價值，遺產和知識匯聚的地方。

所有這些交流和競爭的因素在葡萄牙形成一個巨大的經濟和技術的資訊及知識的集散地，特別是在海上和貿易的領域上。

自14世紀，這方面的趨勢有所增加並驅使國家加強海上成份。增強海上貿易的規模，不論是由王室作主動，例如正如我們所知，在1317年當時D. Dinis國王僱請熱那亞人Manuel Pessanha為船長；還是由私人的經濟和社會力量作主動，例如里斯本和波爾圖的商人在1353年與英國簽訂了一份商業協約，有效期達半個世紀：“……毋庸置疑的是，伊比利亞國家的殖民和商業發展的奇跡在近代的清晨成了可能，而在中世紀末的幾個世紀期間，已廣泛地逐步增加其對外貿易……”<sup>3</sup>。

隨着1383至1385年的危機，國家海上條件這方面的趨勢和潛力成了面對西班牙時保持國家獨立的解決辦法和保證。

---

2. Pierre Chaunu, “Séville et L'Atlantique (1504-1650)”, 第8卷·第1期, “Les Structures Géographiques”, Sevpen, 巴黎, 1959年, 第52頁。

3. Charles Verlinden, “Deux Aspects de L'Expansion Commerciale du Portugal au Moyen Âge”, 載於葡文歷史雜誌, 第4期, 1939年, 第170頁。請參閱 Bailey W. Diffie, 《立國啟示：殷理基王子之前的航行及商業》, Teorema, 里斯本, 1989年 Vitorino Magalhães Godinho, 《葡萄牙的四百年擴展》, E. C. E., 里斯本, 1944年。

海洋成了擴展的自由疆界，同時亦成了賺取利潤的自由疆界並且是很多人（王室、貴族、城市和農村的人民，由商人至木匠和士兵）心目中的個人、家庭和社會獨立的生活保證。

在殷理基王子時期（1394至1460年），海上貿易是大地主、皇家、大部分的貴族及沿岸城市的策略性賭注。

從 D. João 二世（1455至1495年）開始，便由王室政府方面指引着社會和國家活動的核心作全球探險。

策略的潛力（地理上和海上貿易）結合強大的皇家政府權力和一股集各社會團體 / 階層去下注於作為自由疆界的海上擴展：“……在整個15世紀期間，葡萄牙是唯一沒有內戰的完整王國，當時法國正進入百年戰爭的末期……並專注於與敵人布爾戈尼的戰爭。英國正與法國和盧撒人戰爭，而西班牙和意大利正陷於王朝動亂和其他內因……”<sup>4</sup>。

葡萄牙擁有一系列的條件，使其可以在大西洋和非洲西部沿岸進行海上的、貿易的和成為地主的擴展。

在這些地理、技術和社會經濟等條件下，結合王室政府、大地主貴族的政治需要，以及結合細小貴族和非貴族但有一定的參與和經濟動力的私人團體，以大西洋為途徑，在面對西班牙時一起去肯定和鞏固自己的差別和生存方式<sup>5</sup>。同時在14世紀和15世紀初亦結合了矛盾利益，這是在地中海商業競爭和太西洋化夢想的結果，儘管當時要向大西洋南部進發，但已有認知存在的，例如13世紀的熱那亞。

葡萄牙展開了歐洲海上擴展，因此，亦帶來複雜的交匯因素。地理和策略因素使這歐洲邊陲在如此模式的14世紀，成了歐洲南北之間貿易的良好海上航道，“……波爾圖和里斯本城市。（它們是）熱那亞貿易的大中心……”<sup>6</sup>。

地理和策略的因素使葡萄牙沿岸的港口和船隻成為歐洲南北之間航海地圖繪製和船隻建造的綜合匯聚地方，此外，還是伊斯蘭水手（遠離三角帆、船尾舵和航海羅盤的亞洲運輸者）及基督教航海員的綜合匯聚地方。

由於這些使海上擴展成為可能的技術和經濟因素，把海上擴展置於歐洲南部和北部以及歐洲對伊斯蘭的需要和潛力架構內，結合14世紀末和15世紀初從海上尋找面對西班牙時陸上疆界安全的國家需要的因素（政治權力中心路線）。亦結合了14世紀的全球危機：“……葡萄牙人向四方八面的海上旅程和分佈，他們在海外定居加深了之前國家活動的根，但亦造成一個整體綜合的長遠壓力……”<sup>7</sup>。

---

4. C. R. Boxer, 《四個世紀的葡萄牙擴展1415-1825》, Witswatersrand U.Press, Joanesburgo, 1961年 第6頁。

5. 請參閱 Luís de Albuquerque, 《歷史發現概論》, Atlântida, 科英布拉, 1962年。

6. Virgínia Rau, 《歷史研究》, Verbo, 波爾圖, 1968年, 第16頁。

7. Vitorino Magalhães Godinho, 《發現及世界經濟》, Arcádia, 里斯本, 1963年, 第1冊, 第46頁。

### III

葡萄牙向世界擴展的意義可以從四個主要的層面去考慮：時間上的先驅者；空間上的分佈；文明上的多元性和文化上的世界性。

葡萄牙人的海上擴展對比其他歐洲人，在時間上是先驅者，在空間上是唯一者。

在15世紀期間，葡萄牙人前往大西洋和非洲西岸。而在1420至1430年這十年間，已向馬德拉和亞速爾群島殖民。

1434年，葡萄牙的船隻越過博哈多爾角，這是大西洋傳統航行的極限，打開了至非洲幾內亞海岸的航線，並開發了佛得角群島（1440至1460年這二十年間）。70年代，在大西洋赤道的旅程認識了和開發了費爾南多波島、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及安諾本島。15世紀80年代到達了剛果－扎伊爾（Diogo Cão, 1483年）並征服了好望角（Bartolomeu Dias, 1487至1488年），把大西洋和印度洋聯繫起來。

15世紀末，透過華士古·達·伽瑪在1497至1499年的旅程（岬角航道），在歐洲與亞洲之間開拓了定期的海上聯繫。

16世紀期間，葡萄牙人的全球擴展經過了多個海上和沿岸不同地方。在非洲（繼續有意開發內陸，例如Monomotapa，自1514年起），在美洲南部和北部，Álvares Cabral抵達巴西及1500年Corte Real兄弟抵達了紐芬蘭島或於1539年葡萄牙航海家和貴族在開發佛羅里達及1542至1543年開發加里福尼亞（在其他航海方舟中，João Rodrigues Cabrilho成功到達）時扮演着重要角色。

擴展同樣並主要地在亞洲海洋和沿岸進行，從印度洋至太平洋，隨着1509至1511年抵達了馬六甲和Insulíndia（今印尼、馬來西亞一帶），及自1513年開始與中國，1542至1543年與日本達成定期的海上貿易關係後，進展非常迅速<sup>8</sup>。

其他歐洲人向全球的分佈較葡萄牙人晚了許多。西班牙首次較重要的擴展是在1492年，當時哥倫布（1451至1506年），為天主教國王服務，抵達了安的列斯群島海域（葡萄牙人的大西洋擴展是在1420至1430年）。

法國人和英國人海上擴展的首次重要日期僅到了16世紀30年代才出現，而荷蘭的海上擴展到1595至1597年才開始<sup>9</sup>。

葡萄牙人的海上擴展在對比歐洲的其他擴展是先驅者，大概較他們早了七十至一百年。

---

8. 在眾多對葡萄牙擴展的最新總體看法中主要有：B. W. Diffie和W. D. Winius，《葡萄牙王國的建立1415-1580》，Minnesota U. Press, Minneapolis, 1977年（葡文版，里斯本，1993年，全兩冊）；Luís de Albuquerque主編，《葡萄牙在世界》，全六冊，Alfa, 里斯本，1989-1990年；Vitorino Magalhães Godinho，《神話與貨物》，Difel, 里斯本，1990年；A. J. Russel-Wood,《轉變中的世界——在非洲、亞洲和美洲的葡人1415-1808》，Carcanet, 曼徹斯特，1992年。

9. 有關不同的歐洲探險隊，請參閱G. V. Scammel,《環繞世界：首個歐洲海上王國公元800-1650》，Methuen, 倫敦，1981年。

這因素常常沒有被注意到甚至被忽略，它對於自16世紀末期開始，特別是在整個17世紀上半部分有重要的決定性。

在海上和沿岸位置及貿易夥伴上佔先機使葡萄牙人推遲了由英國人和荷蘭人發動的自由競爭的影響<sup>10</sup>。

從知識上和接觸上所佔的先機，在面對其他歐洲人的海上貿易競爭時具有抗衡的能力，這就能更好地推遲他們給予對葡萄牙人的利益和地位的負面影響。這些我們可以稱之為資本和價值的積累，進程上表現在亞洲，特別是在遠東和東南亞某些地區。

葡萄牙人成為首批歐洲人系統地與世界其他地方建立定期海上聯繫的事實，而這事實是發生於16世紀，且在17世紀初是唯一能征服所有大陸（非洲、亞洲、美洲和太平洋）沿岸及重要海洋（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這是十分重要的。

正如Francisco Rodrigues Silveira在1599年所說，如此遠距離和在各海洋的分佈是當時葡萄牙社會以其在16世紀約有人口150萬，而17世紀約200萬所取得的模式（是歐洲擴展中人口力量最低的）。

16世紀，葡萄牙人和葡人後裔在非洲、美洲和亞洲大約有20萬人，在17世紀約有40萬人。

如此局限的人口力量似乎不足以，或至少合理地說明為何能在地球上的海洋和沿岸做到這樣龐大的分佈：“……1527至1531年，葡萄牙是世界海上第一勢力，它的船隻遍佈紐芬蘭島海洋至伯特（Prata）河，地中海至Flandres（今法國與比利時交界），里斯本至摩洛哥，巴西至美格（Meca）海峽；儘管如此，人口卻未到150萬，應該只有140萬左右……”<sup>11</sup>。

然而，從這樣龐大的分佈，可以看到未擁有人口和經濟實力足以強大到單獨做到重大而專門的投注的一個中心和社會成了可能，所以，在多個前鋒面和各方面與其他歐洲人相比，有着很多不足之處，要在多重困境和空間中尋找權力遊戲的平衡補償。

在每一角落進行人種混合及非洲和美洲的奴隸販賣會是人口補償的機制，這機制，儘管只是部分地，相對於16世紀時已有一定人口的歐洲其他社會顯示出人口的差異，當葡萄牙人有150萬時，英國已有300萬名居民，西班牙700萬，法國1400萬。

當地和國際海上貿易的經濟中介及先驅者的角色，構成了超越或減輕人口限制的元素。在17世紀的下半部分期間及隨着歐洲海上擴展國之間競爭的提高，這限制愈來愈成了舉足輕重的因素。

15至17世紀期間，這細小人口的葡萄牙人及葡人後裔是開拓新大陸的最重要的其中一支隊伍，是在原始世界建構上作為全球溝通網絡中最具動力的社會發條。

---

10. 有關在亞洲海上的歐洲競爭和葡人的衰落 / 圖存，請參閱A. R. Disney, 《胡椒王國的衰落》，ed. 70, 里斯本, 1981年; G. Bryan Souza, 《殘存王國》，C. U. Press, 劍橋, 1986年及Niels Steensgaard, 《戰船、商隊及公司，十七世紀歐亞貿易中的結構危機》，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Copenhagen, 1973年。

11. Vitorino Magalhães Godinho, 《舊葡萄牙社會的結構》，Arcádia, 里斯本, 1971年, 第12頁。

## IV

15世紀期間，葡萄牙人的海上擴展分為兩大發展階段，兩個階段相隔少於十年，1460至1469年，原因是某些封閉和地理策略的未定義。

首個階段從1415年（攻佔休達）、1420年（大西洋航線），直至1460年（塞拉利昂）。是整個用以擴大大西洋－非洲的權力疆界的社會和文化結構的誕生。

由1415至1460年，葡萄牙人擴展的路線圍繞着三個主要的目標：開拓非洲北部及拓展馬德拉和亞速爾群島的生產空間，橫越博哈多爾角的旅程並向它的南部航行，朝赤道進發。

這個階段發生於殷理基王子時期（1394至1460年），極富個人進取和聯合的時期。它的海上貿易投資行為，旨在協調王室與私人大地主之間的資源和利益。規範或相衝或和諧的貴族與商人之間的活動（藉征服或佔有／參與各網絡和貿易產品，尋找財富、土地）。

同樣嘗試把擴展和歐洲基督教，海上貿易活動和宗教理念（與教庭的關係，是歐洲人開展國際關係和動員基督教團的財力和軍隊的合法大中心）的意義融為一體。

第二大階段由1469至1498年，就是說，自國王D. Afonso 五世與商人Femão Gomes所訂立開發非洲海岸的合同開始，直至華士古·達·伽瑪抵達歐洲和亞洲海上聯繫的加爾各答為止。

國王D. João 二世（1455至1495年）是這次技術征服大西洋南部及大西洋－印度洋聯繫的海洋、島嶼和沿岸等活動的重要中央策劃者。

透過其中央集權和有計劃的政治活動，當時葡萄牙人的擴展主要採用官辦和大地主重商主義形式，在面對西班牙的競爭下確立了影響的區域（托爾德西拉斯條約，1494年），朝向東方的最高目標（在眾多事實中，如Pêro da Covilhã的陸上旅程所證實）及在航海技術和科學領域上專門化。

16世紀期間，葡萄牙人的全球分佈集中於由官辦發起和規範。中央權力策劃者向喜好冒險的私人地主和貿易商人開放。在里斯本或果阿的政治和經濟的中央權力下，在海外開放一個空間和人的實質自治，直接地協調長途航行。

這個貿易和地主的組織主要透過兩個不同模式落實：一是海上貿易的互相聯繫，一是空間的創造。

“印度政府及路線”與航線網絡構成最重要的海上貿易相互聯繫，這個網絡由好望角至日本，在這條岬角航道上找到一完整的職能，就是里斯本－果阿的海上聯繫。

“印度政府”顯示葡萄牙人擴展的最大靈活性，由非洲東部沿岸至遠東沿岸，以一個語言、宗教和政治的最小單位為基礎實踐了一個分佈、變化和人種混合。

“印度政府”是按照以最小的地域（在幾個戰略地點分佈的商站和炮台去控制或參與海上商業航線）達致最大專門性的海上貿易組織。

為了由最小的地域和人去達致最大的空間參與或統治，需要有一海上霸權，而事實上，16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在印度做到了。這個海上霸權由幾個戰略點和港口諸如奧爾木茲，果阿和馬六甲支援。



自1502年，透過“海上通行證”制度，即由葡萄牙人向非基督教徒航行發出的安全通行證及Afonso de Albuquerque的行為，於1509和1515年間為葡萄牙人的海上霸權奠定了條件，他們局部地在印度洋主要區域控制了海洋、貨物和船隻的往來：

“……在整個16世紀期間，葡萄牙的艦隊無疑擁有印度洋的霸權，及至1570年，馬來西亞海域的霸權；非洲和巴西之間的大西洋正處於其統治下。整整一個世紀，葡萄牙貿易擁有岬角航道和莫三鼻給及馬六甲基督教條約的壟斷權……”<sup>12</sup>。

“印度政府”的統治特徵是：海上活動，貿易經濟和城市特性。社會基本單位是個體與政府－教會聯繫或私人和組別的主動。特別是後者，“獨營者”和“聯營者”，創造一個與東方現實文化交流的程序。這使他們全部或準確地遠離印度政府機器的官辦網絡。

印度政府的經濟基礎以至想接觸東方的葡萄牙人的私人主動是海上貿易。整個海上貿易網絡提供並促進亞洲不同地域之間的交往以及歐洲和亞洲之間的交往。

在這溝通服務的結構中所涉及的龐大貨物，簡短來說有：Malabar（今印度西部沿岸）和印尼－馬來西亞的胡椒粉和姜；班達的豆蔻和乾果；錫蘭的玉桂；德那第的丁香；波斯和阿拉伯的馬匹；中國的黃金、絲綢和瓷器；日本的銀和銅；非洲東南部（Monomotapa）和蘇門答臘的黃金等。

整個海上航線網絡的香料和手工豪華的珍貴金屬，以至糧食和日常用品，都可在其支援點奧爾木茲、果阿、柯欽、馬六甲及澳門找到，這些地方都是商站和炮台及港口城市的所在地。

從16世紀至17世紀中葉，葡萄牙人在東方的出現可以分成三大階段。

首個階段從1497至1499年華士古·達·伽瑪的旅程和1500至1501年Pedro Álvares Cabral開始，直至1515年Afonso de Albuquerque去世為止。這個階段表現為十分迅速的分佈，由非洲東岸至中國南部沿岸，且隨着印度政府和路線的成立，在印度洋建立了一海上官方霸權。

這官方海上政治組織建基於商站和炮台、武器（海上火炮和帆船力量）及海上通行證上。海上通行證是一種旨在排除或打擊伊斯蘭教海上貿易地位的海上貿易關稅。

第二大階段，由1515至大約1560年，是葡國官方權力在東方海上的上升時期，果阿是當時印度政府和路線的首都，歐亞海上貿易的中心，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跨域網絡和多條航線中的貿易漸漸被控制或參與。

第三個階段，由1560年至17世紀中葉，是葡國官方權力的倒退時期，印度政府和路線逐漸衰落。倒退主要是葡萄牙人面對東方的“獨營者”和“聯營者”的競爭。

---

12. Vitorino Magalhães Godinho, 《發現及世界經濟》, Arcádia, 里斯本, 1963年, 第1冊, 第45頁。

非官方聯繫且受其他文化薰陶的葡萄牙人和東方葡人的力量上升，面對當地貿易網絡：印度洋（例如，孟加拉灣的情況），印度尼西亞群島和中國海上（澳門－馬尼拉－長崎）等當地貿易使岬角航道遂漸衰落和無法維持下去。

在面對私人 and 半官方海上的勢力使官方海上權力倒退的同時，葡萄牙印度政府和路線亦要面對其他歐洲海上權力（荷蘭人和英國人）以及東方當地的細小海上權力的倒退<sup>13</sup>。

巴西，正好與印度政府相反，把社會的基本單位建基於大莊園的殖民家庭。過着奢華的和被侍奉的生活，而經濟基礎是在於農業財富和利用奴隸從事單一的甘蔗作物、畜牧等，海上貿易活動只作為開發農業、莊園和村鎮的一種補充活動。

在東方的分佈和在巴西建立文明空間，主要是在社會文化方面靈活回應每個空間的條件和每個不同實況的可能和限制而成的規則。

“印度政府”和巴西各有其模式，均代表着葡萄牙人向世界擴展的適應和相互溝通的原則。對不同空間，不同權力規則及不同形式人民的適應。

這種適應各方面的能力，在16世紀的東方表現為各種貿易色彩的模式，而在巴西則為建立農業，並且在15世紀已顯示出來。

當時，對仍在孕育或嘗試形式的16世紀的情況下，在非洲大西洋出現一個海上相互溝通網絡（黃金、辣椒、奴隸）及一個農業生產空間（在馬德拉從事玉熟黍和甘蔗的單一作物）。

這種海上貿易聯繫和生產空間的矛盾，在15和16世紀期間，應視為對存在的條件和可能限制的適應的補充。正如所見，是矛盾的補充和漸進，例如在馬德拉和巴西既是港口，又是生產空間的角色：“……一個遍達全球海洋的王國，這話無疑是指商業，但同時亦指土地和農業……”<sup>14</sup>。

相互溝通的能力是需要和可能的正面回應，在15和16世紀，葡萄牙人成了種族和空間的最大混合者，貨物和有價物的最大運送者，宗教和習俗的傳播者，正如所見，例如，植物和糧食的交換（番薯、香蕉、腰果、杏仁等）以至可口愉神的飲品（茶、酒、煙草等）。

這無限“……使全球貿易化的地理革命……”（Vitorino Magalhães Godinho）就是開拓新大陸：“……15和16世紀的歐洲擴展儘管最終發現大量其他大陸，基本上由海路進行，打開了和展開了新的航線，藉着至當時還不常到

---

13. 對葡萄牙人在東方的最新總體看法有：Luís Filipe Thomaz, 《從休達至帝汶》，Difel, 里斯本, 1994年和Sanjay Subramanyam, 《葡萄牙王國在亞洲1500-1700——政治及經濟歷史》，Longman, 倫敦, 1993年（葡文版, Difel, 1996年）。

14. Vitorino Magalhães Godinho, 《發現及世界經濟》，Arcádia, 里斯本, 1963年, 第1冊, 第45頁。

(或很少到)的空間，去聯繫遠方已有凝聚但長期處於邊陲地區和與之缺乏溝通的各個複雜社會－經濟和文明，因為活動，或者說，人和物的多重活動是航道網路的革新，以其固有的傳送和交換去連接地球上大部分的地區……”<sup>15</sup>。

## V

由於是時間上的先驅者、空間上的最廣分佈及具有與各種條件適應的能力，葡萄牙人在15和16世紀的擴展對世界文化的誕生作出最大的貢獻<sup>16</sup>。

在這時期，葡萄牙語成為海上貿易溝通的最佳語言（通用語言），特別是在非洲和東方沿岸，透過當地葡裔的形式為之。

在語言範疇內這文明對話的成果使葡語成了在那時期甚至今天夾雜較多源自亞洲，非洲和美洲詞匯的歐洲語言。

與非洲、亞洲和美洲等不同語言的接觸，使之在葡語的字典和文法上形成數量龐大西方不認識的詞匯。

例如，大約於1580至1588年，我們編著了《葡中字典》（在澳門以廣泛的收集形式編成，並由Riccie Ruggiero統籌），這是首部把中文收錄在西方語言的字典；同時於1603年在長崎收集了《日本語詞匯》及於1620年在澳門印製由João Rodrigues Tçuzzu SJ著的《簡明日本語技巧》，兩本均是首批日本語的詞匯和基本文法的西方著作。

與此同時，由於這歐洲以外世界的語言中介角色的直接影響，葡語在歐洲的知識界、商業和政治方面都享有備受關注和接受的地位。

葡萄牙人的著作及葡語的作品均被翻譯成各種不同的語言（拉丁文、意大利文、德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等）並在歐洲的城市（羅馬、維也納、巴斯隆拿、巴黎、倫敦等）出版<sup>17</sup>。

葡萄牙人的海上擴展產生一種專屬文化，它在15世紀表現為上天主宰一切行為的形式，但在整個16世紀期間，獲得了一個具理性和推論的語言、思想和行為產物的廣泛框架。

---

15. Vitorino Magalhães Godinho, 《發現及世界經濟》，Arcádia，里斯本，1965年，第2冊，第593頁。

16. 有關葡萄牙擴展的文化規模，參閱 J. S. Silva Dias, 《十六世紀發現與文化問題》全套著作，Presença，里斯本，1982年及Luís Filipe Barreto, 《發現與復興》，第1冊，Nacional，里斯本，1982年。

17. 請參閱Luís de Matos, 《L'Expansion Portugaise Dans la Littérature Latine de la Renaissance》，Gulbenkian，里斯本，1991年和A. Banha de Andrade, 《世界新大陸》，J. I. U., 里斯本，1972年，全兩冊。

文化中心是透過航海技術實踐而形成，即對於海洋、風和潮汐的規律、航線、船艦等實用和客觀的知識。

這中心地位導致匯聚航海天文學的著作，包括地圖繪製術，造船的實務問題和理論等作品。這三種真實知識作為在征服海洋、航海天文和越洋航行時超越大自然和技術的障礙。

航海天文學作為航海技術、航海圖、航行日誌和海上指南等著作的重要分類。

所有這些文件都是航海的規範和資訊積累而成的教科書，規範部分藉着日盤和太陽、北極星、南十字星、南極星等規律記述了實用而基本的原則和規定，作為航海天文學的培訓和指引。

資訊部分記述了很多關於在太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航行條件資料。總括來說，是介紹船上經緯的計算和海上航行的協調職能，以及關於磁場、風和水流的“知識”和規律等資料。

航海製圖術包括海圖、平面圖和世界地圖，首次客觀地勾劃出接近海洋和各大陸沿岸的輪廓。

葡萄牙人的地圖是具羅經方位的海圖，然而超越了地中海航行的傳統港口地圖集，引入經緯的比例和用以知道水平面上潮水漲退的完整水流圖和探測記錄。

葡萄牙人向全球擴展的地圖繪製術是一套十分精確反映複雜海岸的航海地圖，並很清楚地列出對航行十分重要的地理核心（海角、灣、海灣、島、港口等）。

葡萄牙人的航海製圖術始於1443年，表達那時在歐洲鮮為人知的地區，及在1502年，出現了一張匿名的平面圖，被名為“坎蒂諾”，成為首張現代的航海地圖。

造船的各式實用著作，例如，1616年由Manuel Fernandes著的《木匠設計手冊》，都是藉着推敲一般規範和數量的原則教導人們如何製作良好機器——船（三桅帆船、艦、大帆船）的適當規則和程序的教科書。

航海技術實用技巧方面有兩個主要方面：（一）採用能力，有創意地使用和轉化傳統知識的能力，表現於，例如，作為器材的航海星盤及（二）透過規範實際經驗的思想體系把知識規範化和分類。

第二個文化方面就是批判理論。是由一航海技術的重要成份和另一藥用植物學為輔而形成的科哲空間。兩者“……起着相同的文化作用，因為它們均作為開拓理論，就是說把問題的研究（或從未被討論的）在即時經驗的層面公開……”<sup>18</sup>。

實踐主義是一創作空間，那裏航海資訊，地圖繪製術或醫術出現了由批判方式、科學批判理論而促成的創作潛力。

---

18. Luís Filipe Barreto, 《世界復興時期的葡萄牙信息傳遞者》，Quetzal, 里斯本, 1989年, 第30頁。

這是個人文化和作品的美好地方，在那時期或後來，取得了較大可行性，正如注意到：Duarte Pacheco Pereira（公元1460至1533年），《各地陸上精要》，寫於1505至1508年；D. João de Castro（1500至1548年）；Pedro Nunes（1502至1572年）；Fernando Oliveira（公元1507至1581年），醫藥上，Garcia de Orta（公元1503至1568年），《……講座》的作者，果阿，1563年及Cristóvão da Costa（公元1525至1593年）。

由葡萄牙人向世界擴展所產生的第三個文化方面是描述 / 人類地理學。

是一系列的重要資訊著作，這些著作廣泛、具體和詳細傳達關於非洲、亞洲和美洲沿岸和內陸的地理外貌。

與此同時，這些文獻是其他文明生活的教科書，它們提供關於非洲、亞洲和美洲的各個社會和文化的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資訊。

在數量上佔這方面文化的空間較多，並可能對16和17世紀的歐洲人關於自然和人類的想法造成較大的影響。

在眾多重要著作中，可以隨便列出的例子有：1587年由Gabriel Soares de Sousa著的《巴西概論》或1590年由André Álvares de Almada著的《論幾內亞的河流》。

東方是葡萄牙人的描述地理學和人類學的一片大土地。是海上和陸上旅行的地圖和報告、字典、字匯和各類科學或藝術的入門課本、全球或當地著作的一個無限世界。

簡單和涉及多方面的有自1497至1499年無名氏著的《華士古·達·伽瑪首次印度旅程記述》，以至耶穌會教徒António de Gouveia寫於1654年的《中國君主制度》，這作品被翻譯成葡文，是概述中國的歷史逸事；其中著名的一章是關於孔子的。

亞洲方面，在15世紀末和17世紀中的期間出現，例如，葡人的作品作為首次系統地和全面地描寫東方（1511至1516年由Duarte Barbosa著的《印度風物誌》及1512至1515年由Tomé Pires著的《東方簡介》，首部在西方印行的中國人類學地理誌——《論中國王國》，由Frei Gaspar da Cruz於1570年著，Évora出版，以印度和日本事物為題的叢集於1548年編成，記述1530至1545年期間遠東的資訊。

在文化方面最末是戒律意念。它是擴展文化和關於擴展文化的周界和傳達空間。

空間，以文學、政治、藝術的形式，同樣是多重的，它是葡萄牙人在不同海域和沿岸分佈的價值和意義的問題的整體，他們尋找下列問題的答案“……為何我要作為國家而存在？而在文明及世界的歷史中我的存在又是為了甚麼？……”（Fernando Pessoa）。

主要答案着重於擴展的宗教成份，例如實現基督天主之城，以及開拓新大陸的新價值觀。

因此，葡萄牙擴展的意義建基於在物質和文化方面對開拓新大陸作出決定性和獨一的貢獻。

在整個15、16和17世紀期間，葡萄牙人對地球文明的誕生作出貢獻。當時地球文明毋庸置疑是停留於不公平的交易機制，但與此同時，在不同社會和文化之間產生了首個全球的交易系統：“……由1400或1450年至1850-1950年間的世界歷史面貌仍是一派古舊的，這古舊面貌為始於十五世紀末的多個世紀的變動結果所打破。相對於此一主線其他的均為次要……”<sup>19</sup>。

藉海上擴展，葡萄牙人實現“……取得人類整體的資本……”（C. Verlinden）；並且具決定性地參與開拓世界，與不同的地方和人接觸和交流，我們現在及將來越來越多地在那裏生活：“……世界急劇變得更為廣闊，文明和經濟不再專屬於歐洲。活動範圍擴大了，人類取得自己整體的意識。一個世界經濟正在誕生……是葡萄牙人他們對這奇異擴展活動給予首個的動力……”<sup>20</sup>。

---

19. Fernand Braudel, 《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十五至十八世紀）》，第3冊，Teorema, 里斯本, 1993年，第461頁。

20. Charles Verlinden,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Économique Générale”, I. Universidade, 科英布拉, 1958年，第87-88頁。